

易立竞访谈录

打量

易立竞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易立竞访谈录

打量

易立竞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打量 / 易立竞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2. 1

(易立竞访谈录)

ISBN 978 - 7 - 5495 - 1070 - 2

I. ①打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名人-访问记-中国-现代 IV. ①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2864 号

出品人:刘广汉

策划:魏东

责任编辑:余红

装帧设计:赵瑾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31260822-129/139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:7.125 字数:120千字

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病人崔永元	1
朱军和《艺术人生》的更年期	39
姜伟:不是人人都想出名	73
赵薇:我是新娱乐时代的实验品	91
陈宝国:就这十年,混得还算可以	109
郝蕾:我是一个不耻笑自己选择的人	119
公民姚晨	139
李雪健:因为没死,就想活得更有意思	175
刘晓庆:我的人生波澜壮阔	189
跋 使“蚂蚁”具有丰富的人性	
——易立竞的采访与写作	215

病人崔永元

老电影王国

北京高校图书馆四层,《电影传奇》工作室。

办公室墙上贴满老电影海报,都是崔永元的私藏。六七岁开始,至今,收藏了三百多张海报,三千多本电影连环画、小人书。其中有几张海报电影博物馆想要,他不打算给,因为都只剩一张。崔永元身着大裤衩和短袖T恤,手里夹着根烟,里里外外地带我参观他的老电影王国,每张办公桌的电脑屏幕上都是一张老电影明星的旧照。

正赶上他和员工们吃晚饭的时间,“我不饿,咱们先聊着”。这一聊,就是七个小时,从傍晚到半夜,崔永元除了不离手的烟,只喝了点水。

“我抽烟特别厉害,之前戒了很长一段时间,2002年得抑郁症以

后又开始抽，一天要抽三包烟。”

“抽这么多烟，身体受得了吗？”

“一般身体受不了，但是疯子就受得了，抽五包都受得了。”

《电影传奇》的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，因为抑郁症，晚上失眠，一般上午能睡上三四个小时。采访当天“几乎没睡，又跟他们说了一下午的工作”，他微皱着眉头，握手时有气无力，说话声音也小，可谈到“影视现状、社会环境、媒体的责任与良心”这些问题时，崔永元的精神头儿上来了，音量越来越大，烟蒂被掐灭的频率越来越高。

一闻到小人书的味道，心里就平静了

在中国，姥姥也疼舅舅也爱的主持人，大概只有崔永元一个。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叫他小崔，这一称谓已然表明一种态度。

一开始做《实话实说》时，崔永元特别有信心，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银发了还坐在这个演播厅里。

1999年左右，电视环境开始变化，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，《实话实说》开始走下坡路。“一开始，我认为能抑制这种下滑的趋势，让它继续往上走，后来发现抑制不了，就彻底绝望了。”不想看着自己参与创办的节目这样下去，2002年，崔永元离开了《实话实说》。那时，他的抑郁症已经非常严重，离开《实话实说》后，他住进了医院，病情严重到需要二十四小时陪护，甚至想过自杀。

大家发现崔永元“较真儿”是在电影《手机》上映时，崔永元“炮轰”电影《手机》、导演冯小刚，前段时间又爆出“收视率是万恶之源”、“《超级女声》低俗”等惊人之语。

所谓的“炮轰”，按崔永元的想法，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，他说自己是精神病，跟环境格格不入。

近一年多来，除了在《小崔说事》和《电影传奇》里露面外，媒体上鲜有他的报道。“大概有一年了吧，我把手机号换了，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记者知道我的这个手机号码。”他不信任媒体。

崔永元说离他心灵最近的是一些死去的人。

他看费穆（《小城之春》导演）的书，“上面谈艺术片和商业片的话，和我说的太像了。他说：‘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、迎合票房，我热爱艺术，但同时又享受着孤独，谁能理解我。’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特别伤感。这是费穆 1948 年说的，2005 年了我还在这样想，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”。

他说《小崔说事》只是一份工作，靠这个挣工资，养家糊口。《电影传奇》则是他的灵魂，“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，在老电影创造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，当我面对现实，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，我可以退回到老电影的梦境里。它让我有一条退路，而不是死路一条。我每天睡不着觉，心情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，看老电影的小人书，看老电影的剧本，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切，都会让我平静下来。我跟你说到了什么程度——那些小人书，因为时间长了，有点发霉的味道，一闻那个，心里就平静了”。

采访完,他们都请我吃饭

崔永元生于天津,父亲是工程兵,到处铺路架桥,“教育我们兄妹四个的事基本交给我母亲了。母亲很怕孩子学坏,所以管我们很严厉,基本上是以打为主,以骂为辅。我经常看见两个哥哥挨打,我自己挨过很多次打,现在想来后背还有点发凉呢,一点都不轻松”。

崔永元四岁时举家迁进北京,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。曾经是个淘气的学生。他干过很多让自己都崇拜的事,“我可以上着课,背起书包就走了,而且是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。有一次,老师讲得挺认真的,我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走。于是我决定分两步,第一步把书包从窗户扔出去,第二步老师回头写字的时候我就跳上窗台。结果还没跳下去呢,老师就回头了,我就很尴尬坐在窗台上,老师问我在那儿干什么,我说没干什么,就下来了。结果坐在教室里面听课,还惦记着外面的书包,一堂课也没上好……好像忽然就没人管,是一种野生的状态了”。

1981年,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。上大学时,崔永元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好几个档次。“那时我哥在部队一个月才挣7块钱,我姐做学徒工才19块钱,但是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出5块钱来装扮我,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。那时候尽管家庭条件不太好,但我每个月都要花家里70多块钱。班里的同学一般一个月才花25块钱。”吃和买书占据他绝大部分的开销,当然“有时候会带上别人的女朋友去看电影,因为自己找不到”。

1985年,大学毕业后,崔永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。“第一年做《广播报》,相当于《电视报》这种,介绍节目。第二年开始在《午间半小时》做记者。《午间半小时》是当时的《实话实说》,非常厉害的,全国广播界都在学它。1987年到1996年,我做那档节目九年,收获特别大。因为它是个综合节目,我们没有领域限制,特别自由,我采访保险可以采访半年,把保险搞了个门儿清,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上保险。我在国家体委泡了半年多,整个足球黑幕我全明白,所以我不写关于足球的事儿。我到边防采访了几个月,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计较,为了和平,那样地工作着,我特别感动。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,有机会见到了很多专家学者。听他们讲我不知道的知识,我感觉特别充实。”

由于精力旺盛,不安于现状,1990年代初,崔永元兼职到中央电视台策划《东方时空》等节目,那之前,他得过两个“中国新闻一等奖”。提起这个,崔永元很骄傲:“这是硬指标。”

“我二十二岁开始做记者,最贪玩的时候,打牌、下棋可以到天亮。但当我有采访任务,要写稿子时,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。他们在我旁边打牌,我会伸过头去看,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,写稿子。二十多岁,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。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。我一直觉得,作为一个职业记者,一定要尊重被采访者。每次采访,我都会尽可能地搜集对方的资料,这点经常让对方很感动。采访完,他们都请我吃饭。这也是一个硬指标。”

你看什么人都不顺眼,要不你先帮着做几期

《实话实说》刚开始试了至少有 30 个主持人。

那时崔永元在做另一档节目,《实话实说》节目组经常到他的机房试带子。

“这是干什么呢?”

“这是一谈话节目,挑主持人。”

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谈话节目,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
他们在机房看台湾地区、美国同类型的节目带,崔永元感觉挺好玩儿,“一个人说话,就能让大家高兴”。

挑主持人时,他经常在旁边提意见:“这个不行呵,连基本的语言组织能力都没有,心里想的事表达不出来;那个声调太高,这个全是套话……”

最后把 30 来个试镜的人都否了。

制片人时间说:“你看什么人都不顺眼,要不你先帮着做几期?主持人一到位你就走。”他根本没觉得自己能做主持人,因为当时电视主持人对形象要求很高,长相一定要浓眉大眼,发声吐字要用播音员的标准来衡量。“我和白岩松、方宏进、水均益当然都不行。今天走到这一步了,回过头看时,是一个革命性的动作。”

收视率是万恶之源

易立竞：先求证一下，“收视率是万恶之源”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？

崔永元：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，去了后看到标题，才知道是“抵制庸俗化”。这个会我愿意参加，我有话要说，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。

“收视率是万恶之源”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，他是个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。他讲这话时，既有前提，又有论据，而不是喊口号。我说不是我说的，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，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，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：收视率是万恶之源，没有问题。

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说：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，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，是收视率闹的鬼，所以“收视率是万恶之源”。表述得非常清楚。他说这话时，我注意到现场大概二十多家媒体的记者，他们在那儿聊天，发短信，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，当时我就想，可能会出问题。

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，一个是时统宇，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，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。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，都是我和李咏、朱军的，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。多万恶啊你说，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，那么多明确的、清晰的、真实的观点，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、批斗会，这不万恶吗？非常

万恶！

易立竞：你觉得《超级女声》庸俗吗？

崔永元：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：《超级女声》这样庸俗的节目，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。我记得大意如此。为什么不利？他没有解释，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。在我、朱军、李咏三个人的发言中，好像我跟朱军提了，李咏没有提。我提的是，比如央视十套《人物》、《探索·发现》这样的节目，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《超级女声》比较的。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，讲什么是公共电视，什么是商业电视。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，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（笑）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大概过了五六天，好几个朋友问我，你为什么老攻击《超级女声》呀？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《超级女声》了，可能性很小啊，因为我都没有看过《超级女声》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《超级女声》。

易立竞：你没说过《超级女声》庸俗？

崔永元：我当时就是说，像《人物》、《探索·发现》跟《超级女声》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。《超级女声》无疑是娱乐节目，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。

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。比如《焦点访谈》和《新闻联播》。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，晚间7点到9点档，都是高收视率时间（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，而且都是央视一套节目挣的，其他那么多频道，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）。如果你把《焦点访谈》安排到凌晨1点半，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

率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离黄金时间越近,收视率就越高。

易立竞:你后来仔细看过《超级女声》吗?

崔永元:人家老说我骂《超级女声》,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。这个时候不能退,男人不能退啊,不能说“我没骂过《超级女声》,对不起我特别喜欢《超级女声》”,我才不是那种人呢。我看了10分钟,确实不好,节目不好,就可以骂,没有问题。

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,青春活力,特别可爱,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,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画脚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,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;为了活跃气氛,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,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。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?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,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。下面观众哄声四起,我认为非常恶心。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!

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:什么叫公共电视?什么叫商业电视?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。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,收看不受限制,任何人、任何时间都可以看。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《超级女声》理念的人,包括孩子,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?爱上是什么意思呢?

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,都有个告知的义务,你愿不愿意参加?如果愿意,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,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。参与者要有知情权,甚至要签合同。在做《实话实说》时,我们也没有规范,不签文本什么的,但是我们都会告知。很多人第一次上电

视,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。在国外,这是有法律界定的,我们国内是靠道德。显而易见,《超级女声》连这个都没做,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。

易立竞: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,才能讨论《超级女声》吗?

崔永元:一定要这样,否则《超级女声》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。公共电视,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,这个责任就是:教育。我们看到“教育”这两个字时很刺眼,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“教育”,说你教育谁啊,你让我们高兴就行了。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,宣传民族传统、民族文化,表述各党派政策,不做评论,它就干这个事,服务人民。

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,为什么?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,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,就算投入产出,就算利益最大化,只要能多挣到钱,又不被人抓到尾巴,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。卖衬衫是这样,卖袜子是这样,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。回过头来说《超级女声》,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,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,管得着吗?卖得好就行。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,那就不止骂,而且还必须封掉。

易立竞: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。

崔永元:对,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: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?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?弄得电视人没法做。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,分清楚谁是公共

电视台,谁是商业电视台。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?有没有商业电视台?比如中央电视台,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,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,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?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,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,没人同意我们做,得台里立项,上级批准才可以,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?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,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,还是做娱乐节目,都会面临种种困惑。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,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《超级女声》。

易立竞:你不承认《超级女声》有非常高的收视率?

崔永元:我不承认。如果说它收视率高,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。我去过日本,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,日本人口一亿多,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,一万一千个收视仪!我们也做过测试。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五百个,多则两千个,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!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,就要花力气去做。一边觉得它重要,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,对不起电视制作人,也对不起观众啊!

易立竞: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《超级女声》,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“站到人民的对立面”吗?

崔永元:我不怕。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。我清楚地记得,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,其他人都赞成,只有一个人弃权没投票,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,历史证明她是正确的。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,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是对的。这不是《超级女声》节目本身的问题,而是我们的体制问

题。其实我也为《超级女声》的操作者鸣不平,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易立竞:毋庸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《超级女声》。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?

崔永元:我认为有两种可能,第一种是《超级女声》很好看,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;第二,是《超级女声》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,议题操作得多。

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,就可以让《电影传奇》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。为什么?只要崔永元在拍摄《电影传奇》的过程中,每两天出一个绯闻,那《电影传奇》就是街谈巷议的话题。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。

易立竞: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靠收视率决定?

崔永元:如果你问主管领导,他们都说不是——有观众评价,领导评价,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。他们会说很多,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,只是收视率。收视率低,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。

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

易立竞: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?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。

崔永元:我女儿快九岁了,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,她也不是很开

心。我不在家时,她看美国、日本动画片,我回家了,她说:“爸爸回来了,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。”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,其中一个讲海洛因,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。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,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,但看这个节目时,我女儿又说,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?为什么呢?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,贩毒、杀人、毒瘾发作,她受不了。

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,何况商业电视,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?

易立竞: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,现在看来,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,还是相反?

崔永元:越来越多了,不可抑制,庸俗到头了,要复苏了,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;如果复苏不了,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,已经到头了。我没反对庸俗化,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,我再明确表述一下,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。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,所以老瞎争,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如果我做商业电视,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,我有好多招儿呢。做商业电视,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,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。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,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,一点意义都没有,对谁都不公平。

易立竞: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,你能举个例子吗?《超级女声》可以作为例子吗?

崔永元:说实在的,我就看了10分钟,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。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做谈话节目,采访一个艺术家,这个艺术家